

李大钊对中共早期军事斗争思想 形成与发展的重大贡献

于化庭

(国防大学 科研部, 北京 100039)

摘要:文章以中共早期军事斗争思想的形成及指导大革命时期的军事工作实践为依据,深入分析李大钊对中共早期军事斗争思想形成与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这些重大贡献主要包括:李大钊为党在创建时期形成正确的军事斗争思想进行了长期的理论准备工作;在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建立民主革命联合战线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在领导北方地区党的军事工作中积极贯彻和发展中共早期军事斗争思想;在北伐战争准备和实施阶段领导北方区党委进一步发展了中共早期军事斗争思想。

关键词:李大钊;军事工作;军事斗争思想;国共合作;联合战线;北伐战争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17)04-0032-11

DOI:10.16160/j.cnki.tsxyxb.2017.04.005

On Li Dazhao's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PC's Early Thought on Military Struggle

YU Hua-ting

(Departmen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39,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formation of CPC's early thought on military struggle and the military work guided by the thought,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has made an in-depth analysis of Li Dazhao's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PC's early thought on military struggle, which includes his long theoretical prepar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ought on military struggle when CPC was first founded, his key role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irst KMT-CPC coopera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United Front in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c revolution, his enthusiastic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s early military thought in the military work in north China, and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CPC's early military thought by the north branches of the Party under his leadership before and during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Key Words: Li Dazhao; military work; thought on military struggle; cooperation between Kuomintang and Communist Party; United Front; Northern Expedition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和革命事业的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李大钊对中共早期军

事斗争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及其取得的许多成功经验,都需要进行深入地研究和总结。中共早期军事斗争思想是指中国共产

作者简介:于化庭(1939—),男,吉林梅河口人,教授,主要从事党史和军史、战史研究。

党在创建时期逐步形成的军事斗争思想,包括前期的理论准备和在中共二大上提出的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加入民主革命战争”和以“联合战争”手段实现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等指导思想。中共早期军事斗争思想在指导大革命时期党的军事工作实践中得到了完善和发展,特别是李大钊在指导党在北方地区的军事工作中,较好地贯彻和发展了这个军事斗争思想。深刻认识李大钊对中共早期军事斗争思想形成与发展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对推进李大钊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为党在创建时期形成正确的军事斗争思想进行了长期的理论准备工作

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的先进分子”^{[1]42}。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李大钊十分重视研究和阐述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与军事斗争方面的思想。俄国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先后发表了数十篇论及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文章以及进行这方面的讲演,为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指出了明确的方向。李大钊特别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战争理论和暴力革命的思想,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根源、战争性质和消除战争的途径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从理论层面上作出许多重要论断。这些重要论断对于中国共产党在创建时期逐步明确革命斗争的方向、确立党的革命纲领,进而形成中共早期军事斗争思想,都发挥了重要的理论导向作用。

李大钊的许多论著对资本主义发展与战争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李大钊强调,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之后,由于国家的界限已经不能够“涵容它的生产力”了,资本需要打破各种界限,而不断向外输出,这就必然造成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扩张,从而使战争不再是偶然事件,而是帝国主义本质的反映。因此,帝国主义分子都千方百计地想使自己国家“由一个强国的地位进而为世界大帝国”^{[2]599-600}。李大钊的分析结论是:“战争的真正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2]594}针对帝国主义列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加紧掠夺的现实情

况,李大钊还指出:“资本主义存在一日,决不能有真正的和平,尤其在资本主义已经到达它的最后的阶段帝国主义时代的今日,战争的危险更是一天一天的逼紧。”^{[3]841-842}李大钊在列举了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战争准备的种种事实之后,强调指出:“我们可以明明白白的看出,各国的资产阶级正在准备那拿无产阶级大众作牺牲的新帝国主义战争的情形了。”^{[3]842}这就把当时的战争根源问题阐述得十分清楚了,而且这个论断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在明确了战争根源之后,就需要唤起人民群众起来反对战争,进而消除战争根源。对于消除战争根源的手段,李大钊强调:必须进行民主主义革命,像俄国的十月革命一样,推翻不断发动侵略战争的沙皇政府。为此,李大钊对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个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2]598-599}。在《庶民的胜利》中,李大钊热情地赞扬十月革命,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潮流,对于十月革命开始的世界新潮流,我们“只能迎,不可拒”,并阐明“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4]。这就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斗争方向:要彻底消除战争,就必须发起“全世界无产庶民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2]600}。这就是列宁指出的我们必须“用战胜资产阶级的办法而不是靠祈求来消灭剥削、贫困和战争”^[5]。显然,李大钊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根源与实施暴力革命、开展军事斗争的观点,为中国共产党在创建时期确立自己的革命纲领、形成正确的军事斗争思想,进行了长期的和必要的理论准备工作,也是李大钊作出的重大理论贡献。

中国共产党在创建初期就确定了实行社会革命的政治任务,并在中共一大纲领中旗帜鲜明地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在1922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上,又进一步明确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民主革命任务,并制定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了贯彻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完成当前阶段的革命任务,中共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

的决议案》等一系列决议案,作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决策,并提出加入民主革命战争,以便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势力和民主主义的革命势力合同动作”,“使真正民主主义革命格外迅速成功”^{[6]45}。当然,在中共二大的决议案中也强调指出:“我们加入民主革命的阵线,完全是以他达到工人阶级夺得中国政权的一步过程;所以我们组织民主主义联合战线,是我们一种政策。”^{[6]5}这样,中国共产党通过执行“民主联合战线”这项基本政策,“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我们应该号召全国工人、农人在本党旗帜之下去加入此种战争”^{[6]7}。

中共二大通过制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以及明确党应该动员广大工农群众加入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战争,来确保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成功。这就比较好地解决了实现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基本政策与手段问题,即通过执行“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基本政策、采取联合战争的手段,来实现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初步形成了中共早期军事斗争思想,即“采取联合战争手段实现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军事斗争思想”^[7]。应该说,中国共产党在创建时期形成的中共早期军事斗争思想,反映了李大钊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关于马克思主义战争与革命的基本观点。

在中共二大上能够作出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决定,进而提出加入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联合战争”,是建立在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进行初步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完全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这正如《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宣布的:要实现当前的政治目标,就必须“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因为这种联合战争是解放我们中国人受列强和军阀两重压迫的战争,是中国目前必要的不可避免战争。”^[8]既然中国共产党已经认识到“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的民主革命战争,将是中国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战争”,那么,提出采取联合战争手段来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以实现党的民主革命

纲领的军事斗争思想,就是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正确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在创建时期能够形成正确的军事斗争思想,是与李大钊等先进分子长期进行的理论准备工作密不可分。

二、在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建立民主革命联合战线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在中共二大上形成的“采取联合战争手段实现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军事斗争思想”,即中共早期军事斗争思想,只是从理论上提出了原则性指导思想,这个军事斗争思想能否指导党的军事斗争实践,关键要看“民主的联合战线”能不能建立起来,即能否实现与国民党等革命党派的合作,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否则,中国共产党就无法采取“联合战争”的手段来实现民主革命纲领。但是,要实现与国民党的合作、建立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却是一项极其艰巨、复杂的工作,不仅需要党内取得统一的认识,而且需要采用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合作形式,同时还要推动国民党的改组。为此,中国共产党在二大之后,通过召开党内一系列重要会议,逐步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认识,明确了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原则、步骤和方法。全党经过深入酝酿和不懈努力,逐步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完成了建立民主革命联合战线的任务。而在这个过程中,李大钊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李大钊在中共二大后奉命于1922年8月从北京到达上海,在会见陈独秀之后,出席了在杭州召开的西湖特别会议(亦称为中共中央全会)。这次会议是为了解决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问题召开的,会议经过激烈争论,确定了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方针,即同意共产党员有条件地加入国民党。这个条件就是必须根据民主主义革命的原则来改组国民党,使之能够担负起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艰巨任务。在西湖会议上,李大钊认为:“国民党的组织非常松懈,无政府主义者加入国民党已经多年,挂着国民党党籍,依然进行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并未受到任何约束。即单纯的国民党员也抱有各种

不同的政见,单独从事政治活动的例子也不少,足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同样不会受到约束。”^[9]李大钊的判断是采取加入国民党的方式是实现联合战线的易于行通的办法。

西湖会议结束后,陈独秀就提议李大钊留在上海一段时间,以便共同开展同国民党建立合作关系的工作,进而推动国民党改组。这样,李大钊根据中央的委派,就开始同孙中山联络,推动孙中山进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由于李大钊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就和孙中山有过接触,在1921年夏秋又介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广西桂林会见孙中山,所以相互比较熟悉,便于这项工作的开展。在介绍马林去会见孙中山时,马林曾带去了李大钊致孙中山的信。李大钊在信中述说了十月革命的经验,并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两条建议:(一)要有一个能联合各革命阶级尤其是工农大众的政党;(二)要有真正的革命武装,要办军官学校^{[4]151}。孙中山对李大钊的建议非常赞同,对李大钊的见解也非常佩服。

西湖会议后李大钊能够在上海多次会见孙中山,是因为孙中山这时正在上海避居。由于1922年6月广东军阀陈炯明发动叛乱,使孙中山领导的革命遭受到一次痛苦的失败,迫使他离开广州,到上海避居,并开始重新寻求革命的出路。所以,李大钊在这个期间会见孙中山,同他多次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种种问题”,使孙中山对李大钊的真诚帮助感到非常高兴,两人甚至“畅谈不倦,几乎忘食”^①。由于孙中山对李大钊的为人也极为倾慕,所以愿意介绍他加入国民党。当李大钊说明自己是第三国际的党员时,而孙中山却说:“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作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4]152}于是,由孙中山“亲自主盟”,介绍李大钊加入了国民党。随后,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等中共领导人都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从而迈出了国共合作的关键性一步。

这一时期,苏联政府的特使越飞来到北京。

经过李大钊的安排,通过林伯渠的联络,越飞会见了孙中山。在孙中山与越飞会谈期间,李大钊、林伯渠都参加了会谈,双方深入商讨了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和建立革命军队的问题。此后,孙中山又派廖仲恺为代表,同越飞继续会谈,使国民党与苏联方面在细节商谈中达成了协议。1923年1月,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在一连串的接触和会谈中,李大钊和孙中山建立了真挚的革命友谊,他也成为对孙中山影响最大的共产党人。正是在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孙中山定下了改组国民党的决心。1922年9月4日,孙中山召集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改组会议,经过统一思想的过程,于1923年元旦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表明国民党的革命已经从依靠地方军阀转向依靠人民大众,这是孙中山革命思想发展的飞跃。

1923年6月,李大钊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讨论如何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合作,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以实现党的民主革命纲领。这次大会经过讨论,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同国民党合作的指示,通过了相关决议,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来实现国共合作。解决合作的形式问题有助于加速推进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在中共三大之后,国共两党的关系就成为了“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关系。期间,中国共产党接受了孙中山提出的“国民革命”口号,并赋予这个口号新的含义。陈独秀认为:“‘国民革命’的口号,不但近来经国民党采用,成了全国普遍的口号,并且实际上适合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各阶级联合革命的需要。”^{[1]101-102}这样,国共两党合作所建立的“民主的联合战线”就成为“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了。共同的革命口号,有利于两党的合作,共同推动国民革命形势的发展。

在中共三大期间,孙中山特地邀请李大钊与他在广州会面,讨论广州革命政府的对外政

① 参见李大钊所写的《狱中自述》稿。

策等问题,进一步密切了国共两党的关系。随后,苏联政府根据孙中山的邀请,于1923年秋派鲍罗廷到中国。鲍罗廷先到北京与李大钊联系,李大钊约集中共北京地区负责同志和鲍罗廷一起讨论了国共合作的相关问题。在听取李大钊的意见后,鲍罗廷到广州担任孙中山的政治顾问,积极帮助孙中山进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孙中山在完成国民党改组的准备工作后,于1923年11月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并决定1924年1月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李大钊受到孙中山的邀请,在国民党一大开幕前一个多月就到广州,积极帮助孙中山、廖仲恺等完成国民党一大的各项准备工作,包括会议文件的起草和审定,以及会议代表的确定、大会议程的安排等。

国民党一大于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广州举行,大会由孙中山主持。出席开幕式的165名代表中,共产党员有二十多人。大会期间,李大钊是主席团的五个成员之一,和孙中山共同主持了主要会议,并担任大会的许多重要职务。大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草案。该草案对三民主义作了适应时代潮流的解释。经过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包含了新的内容和新的革命精神,亦称为新三民主义。这样,新三民主义的政纲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在基本原则上一致的,从而能够成为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国民党一大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大会通过的宣言和章程,是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尽管国民党内部对于实行“三大政策”仍有争论,但在孙中山的坚持下,国民党右派在口头上也不能不表示赞成。

国民党一大选举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张国焘、于方舟等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四分之一。随后,召开了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推选廖仲恺、谭平山、戴季陶为中央常务委员,并决定成立中央党部。李大钊后来还担任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一大

的成功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此后,国共两党开始共同推动国民革命形势的发展。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完成建立民主革命联合战线的任务后,中共早期军事斗争思想才能指导党的军事斗争实践。而在这个极其艰巨、复杂的工作过程中,李大钊确实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三、在领导北方地区党的军事工作中积极贯彻和发展中共早期军事斗争思想

国民党一大闭幕后,李大钊在广州继续协助孙中山、鲍罗廷落实国共合作后的一些具体问题,包括黄埔军校的筹办等问题。此后,李大钊担负了国民党在整个北方地区的领导责任,全力推动北方地区国民革命形势的发展。原来国民党在北方的影响很小,只有少数上层人士的党员,在李大钊和共产党人的努力下,很快建立起各级组织,成立了北京市党部、天津市党部、直隶省党部等各级组织系统,后来又成立了政治委员会,作为国民党在北方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加入国民党,并积极开展国民革命工作,使整个北方地区的革命形势呈现出新的气象。

实现国共合作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地区的活动仍处于秘密状态,尽管开展革命工作的难度很大,但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党的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明显进展,在巩固和发展各级党组织、开展工农运动、扩大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特别是在开展军事工作方面,李大钊积极贯彻和发展中共早期军事斗争思想,努力争取和团结各种进步的军事力量,建立起广泛的“民主的联合战线”,从而推动了北方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这时,中共中央对党在北方地区开展军事工作也提出了明确要求。1924年5月,中共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加强北方地区军事工作”的决议。该决议强调:当前党的工作“应当使国民党不仅特别注意于自己军队内的政治宣传,并应注意于有害于民族革命政策的军队中的煽动与宣传,尤其要注意于吴佩孚、张作霖及基督教将军(冯玉祥)的军队”;同时,为扩张国

民革命战线起见,党应注意国民党势力与各种地方军事势力的联合问题,“以在这种军队中宣传为工作之开始”,大力“宣传国民革命”^①。根据中共中央的决议,李大钊领导北方地区党组织积极开展军事工作,重点是在直系、奉系军阀的部队中开展政治工作。同时,重视共产党员在封建军阀的部队中直接掌握一部分武装力量,并大力培养党的军事人才。刘志丹、周益三、张宗逊、李运昌等,都是这时由李大钊决定派到黄埔军校学习的。

尽管中共早期军事斗争思想中所指的“联合战争”,并不包括联合封建军阀中的部分进步势力,也没有提出争取和改造旧军队的任务。但是,李大钊在团结、争取和改造旧军队方面,做出了许多开创性工作。特别是在团结和改造冯玉祥及其领导的国民军方面,李大钊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也取得了明显成效。李大钊通过持续开展对冯玉祥的工作,逐步争取和团结了冯玉祥带领的部队,使之逐步从北洋军阀阵营中脱离出来,转变为“民主的联合战线”的一支重要力量。这是李大钊对建立“联合战线”、实行“联合战争”的范围给予的扩展,也是对中共早期军事斗争思想的重大发展。

李大钊对冯玉祥倾向革命的思想是了解的,早在辛亥革命时期李大钊和冯玉祥就建立了革命的友谊,共同参加了同盟会。此后,李大钊不断向冯玉祥宣传国民革命思想,使冯玉祥的思想觉悟逐步提高,不愿意再为直系军阀打内战。冯玉祥对军阀混战的态度发生变化后,必然要受到军阀吴佩孚的排挤。在冯玉祥陷入困境时,李大钊于1922年夏亲自到南苑,找冯玉祥会谈,为他指出一条光明的出路。李大钊还介绍冯玉祥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建立了联系,1923年上半年苏联政府特使越飞到北京时,与冯玉祥也有过接触。经过李大钊的深入工作,冯玉祥的政治视野更加开阔,在思想上更加拥护国民革命,从而使他带领的部队逐步成为可以联合的进步势力。

在冯玉祥的思想转变之后,他决心伺机脱离直系军阀阵营,进而改变了北方的军阀混战局面。为此,冯玉祥开始秘密联络胡景翼、孙岳等人,准备推翻由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1924年10月,冯玉祥乘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直系军阀兵败山海关之机,在北京守军孙岳部队的配合下,率领部队回师北京,突然发动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首领曹锟、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冯玉祥在发动北京政变后,公开发表了反对军阀割据、要求和平统一等倾向国民革命的政治主张,促使北方地区出现了有利于国民革命的新形势。随后,冯玉祥把所属部队改称中华民国国民军,自任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为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孙岳为副司令兼第三军军长。全军共15万余人,分驻直隶、河南、陕西等省。

冯玉祥的军事力量相对于直系军阀吴佩孚、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军事力量,处于绝对弱势的地位,所以无法控制北京政变后的北方局势,冯玉祥在发动政变后不得不向张作霖、段祺瑞妥协,组成段、张、冯三派联合的政府,以段祺瑞为北京政府执政。在段、张、冯三派的联合政府中,冯玉祥的势力最弱,受到段、张势力的共同排挤,很难持续下去。为此,冯玉祥决定电邀孙中山赴北京共商国是。在孙中山抱病北上之后,虽然扩大了国民革命的影响,但是未能改变北洋军阀政府独裁统治的政治局面。而在孙中山病逝之后,北方的政治形势更加复杂了。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国共产党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于1924年底在北京成立,由李大钊负总责。北方区党委成立初期的主要任务是为迎接国民革命高潮作准备。为了推动北方地区国民革命形势的发展,李大钊决定团结冯玉祥的国民军势力,实施共同反对直系、奉系军阀的斗争策略。这就需要帮助国民军发展壮大,使之成为能够与北方封建军阀抗衡的力量。为此,李大钊派出部分共产党员到国民军中工作,

^① 转引自肖裕声著:《李大钊的军事活动》,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29—30页。

主要在中下层军官和士兵中宣传党的政治主张,使国民军能够在革命斗争中站在工农群众一边,还有部分同志在国民军中担任了军事职务。这样,便于在国民军驻扎的河北、河南、察哈尔、绥远等省开展党的群众工作,使国共两党的各级组织和工农群众运动都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各级工会组织也得到恢复和发展,从而开创了党在北方地区工作的新局面,也使国民革命思想在北方地区得到广泛传播。

1925年初,由于北京政变后的政权已经落入段祺瑞、张作霖之手,冯玉祥受到严重排挤,而被迫提出辞职,而段、张乘机委任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对于这个委任,冯玉祥认为是个阴谋,准备拒绝受命,正在考虑隐退。这时,李大钊组织北方区党委对冯玉祥辞职后的政治形势进行深入分析,认为冯玉祥完全辞职对国民革命不利,必须支持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团结和争取国民军势力,来共同反对直系、奉系军阀的统治。于是,李大钊和孙中山的代表徐谦于1925年1月同冯玉祥进行多次交谈,说服冯玉祥接受西北边防督办的职务,使冯玉祥在徘徊中接受了共产党对他的影响和帮助,也使冯玉祥坚定了加入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决心。这样,冯玉祥就在当年2月到张家口担任了西北边防督办的职务。

冯玉祥到张家口之后,亲自邀请李大钊和徐谦到张家口会谈。这次会谈达成了要求苏联政府给国民军以军事援助的协议,拟定了要求军事援助的大体内容。随后,冯玉祥派出国民军参谋长刘骥到北京,同苏联大使加拉罕进行有关军事援助问题的具体谈判。1925年4月,苏联派驻广州国民革命政府的最高顾问鲍罗廷,专程从广州到北京,准备直接同冯玉祥会谈,以便最后敲定刘骥同加拉罕达成的各项军事援助项目。经李大钊的安排,鲍罗廷与冯玉祥在张家口进行了会谈,顺利达成了苏联政府对冯玉祥部队的军事援助协议。

经过加拉罕、鲍罗廷与冯玉祥的多次接触,苏联方面完全同意对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采取团结、争取的政策,以便在北方地区打开国民革

命的新局面,并希望“由国民军造就一支确实能成为真正革命的军队”^[10]。这样,在李大钊的安排和协调之下,苏联的军事援助从4月开始,就源源不断运达冯玉祥部。5月,以苏联远东军区总司令为首的军事顾问团三十多人,经外蒙古到达张家口,立即展开对军官的培训和部队的训练工作,并在张家口、丰镇、平地泉设立三个训练基地。期间,为了在国民军中深入开展部队政治工作,团结和改造这支旧军队,李大钊又秘密前往张家口,与冯玉祥进行深入会谈。

李大钊与冯玉祥的这次会谈,主要围绕中国共产党人和苏联军事顾问如何在国民军中开展工作的展开。经过李大钊的耐心说服,冯玉祥认识到在国民军各部队中开展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并接受了李大钊的建议。李大钊在会谈中明确指出:“俱乐部应当成为政治工作的基础。要在俱乐部周围建立各种政治与文化教育组织,在俱乐部里开设研究政治经济学小组和研究孙文主义的小组。并且预定成立10个俱乐部。”^[11]冯玉祥在会谈后批准了李大钊的建议方案,并委托李大钊负责领导部队政治工作。这样,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在中国旧式军队中开创了革命的政治工作的新纪元。

李大钊直接领导的国民军政治工作,一方面在国民军部队中建立起政治俱乐部;另一方面,陆续派出一批共产党员到国民军中开展工作,向部队官兵宣传国民革命的纲领和目标。1925年6月之后,李大钊派出宣侠父等共产党员到国民军第一军开展政治工作,又派王若飞等共产党员到国民军第二军开展政治工作,还派魏野畴等共产党员到国民军第三军开展政治工作。在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各界群众普遍声援上海工人运动,冯玉祥也致电声援,并决定给予经济援助。冯玉祥爱国救民的一片赤诚,赢得了广大青年学生的敬重和崇拜,在反帝爱国运动的影响下,在中共北方区党委的组织发动下,各地爱国学生纷纷到张家口,投奔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为了收容这批学生,李大钊、徐谦建议冯玉祥开办西北军干部学校。在冯玉祥接受这个建议后,李大钊亲自帮助冯玉祥筹办

这座学校,并派宣侠父到干校工作。西北军干部学校培养了七百多名国民军基层干部,成为国民革命的重要骨干力量。

经过中共北方区党委和苏联军事顾问的深入工作,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已经明显倾向国民革命,在反奉倒段运动中,在“关税自主运动”中,国民军都站在群众运动方面。在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于10月20日发表《对反奉战争宣言》后,冯玉祥在11月上旬宣布加入反奉的全国战线,从而使国民军的政治影响进一步扩大。这对于推动工农群众运动的发展,进而推动北方地区国民革命形势的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党的建立民主统一战线政策在北方地区的成功贯彻,也是李大钊在军事工作实践中坚持发展中共早期军事斗争思想的重要体现。

对于中共北方区党委在开展军事工作方面所取得的成效,中共中央给予了充分肯定。在1925年10月召开的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就指出,“由于党对争取国民军工作的有力进行,使国内一部分的军队倾向到民众运动这方面来”,使国民军“与国内解放运动发生关系”,参加了“反帝国主义斗争运动”,“产生了军队力量对于革命运动的新作用”^①。这是党中央对李大钊领导的北方区党委积极贯彻和发展中共早期军事斗争思想、创造性开展军事工作所取得的成效给予的高度评价。

四、在北伐战争准备和实施阶段领导北方区党委进一步发展了中共早期军事斗争思想

1925年以来,中共北方区党委通过在国民军中深入开展工作,已经使国民军的势力得到发展,逐步控制了热河、察哈尔、绥远、河南、北京、天津及河北的部分地区。这就造成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恐慌,为防止其在华利益受到削弱,英、日等帝国主义势力暗中策动直系、奉系军阀共同对付倾向于国民革命的国民军。在帝国主

义势力支持下,军阀吴佩孚和张作霖于1925年底结成所谓“反赤”联合战线,以直奉联军的形式对付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致使北方军事形势发生逆转。

1926年1月,直奉联军分别从湖北、山东方向出兵,向国民军发动大举进攻,造成国民军腹背受敌,很快就丢失了河南、河北等地区,迫使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通电下野,企图以个人退出政治活动来缓和反动势力的进攻。但是,直奉联军却继续向国民军大举进攻,进而造成北方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急剧变化。这必将对北伐战争的准备和实施产生重大影响。这时,广州革命政府已经以国共合作的力量统一了广东根据地,中国共产党正在为发起北伐战争创造条件。为了从全局上正确指导全党工作,中共中央于1926年2月21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研究北伐的政纲和开展军事工作等问题,李大钊出席了这次会议。

中共北京特别会议认为:北方军阀建立的“反赤”联合战线,向国民军发动的大举进攻,必将威胁广东革命根据地,“现在的时局,实在是中国革命的生死存亡的关头。固然应该在北方努力集中一切革命势力来抵御帝国主义的反攻,然而根本的解决,始终在于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胜利”^{[1]151}。这次会议明确北伐的准备工作,“不仅是广东作军事的准备,更要在广东以外北伐路线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直隶等省预备民众奋起的接应”。这次会议抓住了时局的中心——北伐战争,适时地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北伐战争方面来,使全党各项工作以北伐战争准备为中心,以军事工作为侧重点,全面开展起来。这就为全党工作指明了基本的方针原则。会议还强调:党“必须加紧在国民军中的工作,帮助国民军成为民众抵抗帝国主义与反动军阀之有力的武装,并须从中造成一部分真正的国民革命的武装势力”^②。

① 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决议案,1925年10月。

② 《中央特别会议文件》,1926年2月21—24日。

根据党的北京特别会议精神,李大钊领导北方区党委把工作重心迅速转移到军事工作方面,使北伐战争准备同争取国民军、分化军阀部队、发展工农运动结合起来,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了中共早期军事斗争思想。李大钊在党的军事工作实践中,特别重视掌握“联合战争”的主导权,这同陈独秀放弃党对“联合战争”领导权的做法完全不同。尽管李大钊还无法直接指挥战场作战,但是能够始终把握战场的全局形势,对重大问题及时提出正确意见和建议。中共北京特别会议后,李大钊根据当时的战场态势和国民军的作战能力,在1926年3月明确提出“国民军撤出北京、退守南口”的作战方针。这个方针得到国民军领导人冯玉祥的赞赏和认可。这是李大钊对中共早期军事斗争思想的重大发展。因为中共早期军事斗争思想存在的明显误区,就是不重视党对“联合战争”的领导权和指挥权的问题,甚至错误地认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将是资产阶级的胜利。正是在军事斗争思想上存在着严重误区,才造成国民党右派势力掌握了北伐战争的主导权和北伐军的控制权,最终改变了国共两党平等合作的关系,使共产党的力量受到国民党右派的严重打压。而中共在北方地区的军事工作中就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根据李大钊提出的作战方针,国民军于4月16日主动放弃孤城北京,主力退守南口。自此,持久的南口守卫战拉开了帷幕。在李大钊和北方党以及苏联顾问的指导和帮助下,南口守卫战坚持了4个月之久,牵制了直、奉系军阀的大量兵力,使之无法南下作战,从而强有力地策应了北伐军向武汉方向的推进。直到8月下旬,国民军才被迫从南口向西撤退。此外,在南口守卫战期间为了阻止吴佩孚抽调部队南下支援湖南、湖北守敌,李大钊还批准了共产党员许权中组织的部队起义,通过这次起义从直系军阀部队中拉出两千余人,从而打乱了吴佩孚组织援军南下的部署,也增加了国民军的实力。

在国民军退守南口前后,吴佩孚还派出直系军阀刘镇华部向驻守陕西的国民军发动进攻。刘镇华率部八万余人(号称十万),于4月初兵临西安城下。当时,驻守陕西的部队主要是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杨虎城部,以及从豫西败退回陕的陕西军务督办李虎臣部。在危急时刻,李大钊和北方区党委派出曾在国民军第三军开展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魏野畴等人,紧急赶到西安,帮助杨虎城等将领组织西安保卫战。魏野畴参加了杨虎城召开的国民军第三军高级军事会议,并详细介绍了北伐军准备消灭直系、奉系军阀的战略计划。这次会议共同确定了长期抗击刘镇华部,使之无法南下作战的军事部署。在共产党人的全力支持下,通过发动群众支援西安保卫战,使西安城内的军民与刘镇华部展开了殊死搏斗,顽强战斗达8个月之久,从而拖住了直系军阀的近十万兵力。这是对北伐军作战的有力策应。

期间,李大钊密切观察北伐战争的全局态势,领导北方区党委全力支持北伐战争、积极配合北伐军作战,并不断向党中央提出建议,在挫败北洋军阀的军事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冯玉祥通电下野后,中国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加紧对冯玉祥开展工作。冯玉祥应邀于1926年5月赴苏联学习和考察。在苏联考察期间,冯玉祥会见了共产国际和苏联党、政、军领导人,并得到中共旅莫支部刘伯坚等人的热情帮助,在思想上取得很大进步。但是,国民军在南口败退后,北方的战场形势日益不利,李大钊决定敦促冯玉祥尽快回国响应北伐。为此,李大钊邀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于右任赴苏联敦促冯玉祥回国。于右任到苏联后,很快同冯玉祥进行了秘密商谈,转告了国内形势和李大钊的意见。经过商谈,冯玉祥接受了李大钊提出的“进军西北,解围西安,出兵潼关,策应北伐”^①的基本方针。

1926年9月,冯玉祥回国途中国内形势发

^① 转引自肖裕声著:《李大钊的军事活动》,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103页。

生了新的变化。一方面北伐军已经攻下武汉,两湖作战即将结束;另一方面,国民军已经撤退到绥远一带,处境十分不利。在紧急关头,冯玉祥给中国共产党写信,以求得共产党的有力指导和支持。李大钊在接到冯玉祥的信之后,迅速报告了中共中央局,同时给予冯玉祥以热情欢迎和大力支持。9月15日,冯玉祥在刘伯坚和苏联军事顾问乌斯曼诺夫等人的陪同下,到达绥远的五原。第二天,冯玉祥向全国发出参加国民革命军的宣言,并很快集合了退守绥远一带的国民军,着手组织国民军联军。9月17日,冯玉祥在五原举行誓师大会,宣布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并带领国民军全体官兵正式加入广东国民革命政府,誓师响应北伐。五原誓师标志着国民军踏上了革命的新征程,从此国民军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指导下,成为北伐战争的一支重要力量。

对于五原誓师后国民军联军的出师路线和战略方针问题,李大钊从全局上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在形成方案之后,及时向党中央写信报告。与此同时,李大钊把国民军的出师路线建议写成密函,派专人给冯玉祥送去。冯玉祥后来回忆说:“李大钊先生派人送给我密件,建议我们出长安会师郑州,我们加以研究,乃决定采用李先生的计划。当定方针为‘固甘援陕,联晋图豫’八个字”^[12]。后来,李大钊根据冯玉祥的请求,通过中共北方区党委向国民军联军各部队陆续派出二百多名共产党员和青年积极分子,从事部队政治工作和训练各级干部,其中不少人是中共中央从留苏干部中调回的。通过中共这批干部深入开展工作,使国民军广大官兵的思想觉悟和作战能力都得到了很大提高。

根据李大钊的建议,冯玉祥指挥国民军援陕部队迅速从五原出发,经过平凉,沿彬州、乾县大道,迅速向西安挺进。在守军李虎臣、杨虎城部的配合下,国民军援陕部队于11月28日击溃了军阀刘镇华的部队,解围了被围困8个月之久的西安城。自此,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

联军与广东国民政府的北伐军遥相呼应,开始了英勇顽强地策应北伐军的作战行动。1927年1月16日,冯玉祥率领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进驻西安。随后,冯玉祥在西安成立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任命于右任为驻陕总司令、邓宝珊为驻陕副总司令,下设各厅、部,成立一个革命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机构,共产党员参加了各部门的领导工作,从而使陕西地区迅速得到巩固。

在国民军联军入陕后,根据李大钊的部署,制定了对国民军的工作方针,迅速整顿国民军驻陕部队。通过整顿部队,使党在国民军联军中的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特别是加强了军队政治工作,配备了各级政治干部,并帮助冯玉祥制定了《国民军联军政治工作大纲》,明确各级政治工作组织的职责、任务,形成了部队政治工作的基本制度。期间,李大钊还指示成立中共陕甘区委,以耿炳光为书记,负责领导陕西、甘肃两个省委,深入开展党在西北地区的全面工作。李大钊在指导、帮助冯玉祥整顿国民军期间,还十分重视党在国民军中直接掌握部分武装力量。其中,国民军联军第二军第二师是中共直接掌握的部队,师长史可轩、团长许权中、团政治处主任马明方等都是共产党员;国民军联军第五军第三师也是中共直接掌握的部队,师长张兆丰和部队中不少官兵都是共产党员。此外,驻陕北的陕西陆军第一师井岳秀部的石谦旅中由李象九、谢子长领导的几个营、连都建立了党支部,共产党员的数量很多,也是中共直接掌握的小部队。为了扩大党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李大钊还指示陕甘区党委,在西安创办中山军事学校。这所军校完全由共产党员领导,专门培养革命的军事政治干部。中山军事学校为党在西北地区培养了一大批军事工作骨干。

针对奉系军阀张作霖准备进击河南的情况,李大钊于1927年1月下旬致函冯玉祥,阐明北伐战争的形势及奉军的企图,建议国民军

迅速制定作战方针,以便“出长安会师郑州”^①,围歼入豫的奉军。冯玉祥接受了李大钊的建议,于2月底决定率兵出陕,“援鄂攻豫,会师中原”。正当李大钊和北方党组织积极领导北方各种反帝反军阀的力量,展开一场策应北伐军河南作战的人民大众参加的军事斗争时,引起了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极度恐慌和仇恨。张作霖派出大批宪兵和警察在北京展开搜捕,于1927年4月6日非法逮捕了李大钊。这时,野心膨胀的蒋介石正在分裂革命阵营,已经投靠了帝国主义势力,并公然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这种形势下,张作霖不顾全国各界人士的正义要求,悍然下令杀害了李大钊等革命者。李大钊英勇就义后,国民军根据李大钊提出的作战方针,继续与北伐军配合作战,共同夺取了河南战役的胜利,击溃了张作霖的主力。

由于在北伐战争准备和实施阶段李大钊领导北方区党委,迅速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军事工作方面,进一步发展了中共早期军事斗争思想,全力掌握“联合战争”的主导权,能够根据北伐战争全局的发展形势,及时提出重大方针原则方面的建议,从而指导国民军联军有效展开了策应北伐军作战的行动。与此同时,李大钊全力推动党的军事工作全面开展,不仅在部队政治工作方面取得明显成效,使党直接掌握了部分武装力量,而且为党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成为党在西北地区开展革命斗争的骨干力量。这些方面都是李大钊进一步发展了中共早期军事斗争思想的明显体现。

尽管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右派的无耻叛变,以及冯玉祥后期的动摇,造成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归于失败,北方地区的革命形势也转入低潮。但是,中国革命却从此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李大钊和北方区党委所取得的军事工作经验和积极主动把握战争主导权的

军事斗争思想,以及党直接掌握的部分武装力量,已经为随后开展的土地革命战争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
- [2] 李大钊文集: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3] 李大钊文集:下[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4] 《李大钊传》编写组. 李大钊传[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5] 列宁军事文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94.
- [6] 中央档案馆.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G].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7] 于化庭. 中共军事斗争史略:上[M]. 济南:济南出版社,2016:4.
- [8] 中共二大史料编纂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84.
- [9] 李蓉. 中共二大轶事[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74.
- [10]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82.
- [11] 维·马·普里马科夫. 冯玉祥与国民军[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11.
- [12] 冯玉祥. 我的生活:下[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495-496.

(责任编辑:李亚平)

^① 转引自肖裕声著:《李大钊的军事活动》,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157页。